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募捐信息该强调恢复还是改善受事件可控性调节

作者：宋文静，陈怡媛，黄韞慧

第一轮

非常感谢编委和审稿专家能够给予我们此次修改论文的机会，也十分感谢审稿专家们对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新的修改稿中，我们试图更明确地定义各个变量的概念，更清晰地阐释理论逻辑，以使文章脉络更加清晰。我们还爬取了二手数据，并在改进实验设计的基础上开展了 3 个新的实验，以期为研究假设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我们希望修改后的论文更具说服力。下面，我们针对论文主要修改内容做了简要总结。

1. 理论方面

- (1) 重新定义了两类募捐信息，从损失规避理论视角论述二者感知功能差异，并修改了假设；
- (2) 将困境原因可控性改为事件可控性，更清晰地阐述了事件可控性的概念、范围及其对个体关注点的影响，并修改了假设；
- (3) 对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对个体捐赠意愿产生影响的假设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并进行了更清晰地逻辑推演；
- (4) 提出投入感是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效应的中介机制；
- (5) 重新梳理了研究框架与实验逻辑。

2. 实证方面

- (1) 二手数据。根据评审专家 1 的建议，爬取并分析了“支付宝公益平台”的真实募捐信息与数据；
- (2) 新的实验。增加了两个新的实验(实验 2a 与实验 5)，并替换了一个实验(实验 3)；
- (3) 合并实验。根据评审专家 1 的建议，将原实验 4a 与实验 4b 合并为现实验 4a；
- (4) 数据报告。检查并更正各处数据报告与图表。

3. 讨论与结论方面

(1) 理论贡献。补充了本研究结论与以往研究的比较与分析；

(2) 实践启示。删除了与本研究无直接关系的段落；

(3) 研究结论。在全文最后补充了研究整体结论。

再次对审稿专家们对论文提出非常详细且极具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表达衷心感谢！

审稿专家 1 意见：

《募捐强调恢复还是改善？困境可控性的影响》一文将慈善募捐信息区分为“恢复/重建”和“改善/提高”两类，并基于调节匹配理论研究了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对个体捐赠的影响。研究中恢复还是改善的角度较有新意，但在研究的逻辑推导、论文写作中存在较多问题。建议大修后再审。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研究视角的肯定！您详细且具有建设性的评审意见使我们对本研究再次进行了深度思考，且为论文的修改完善指明了方向。以下是我们针对每条修改意见所作的详细说明。

在论文撰写上：

意见 1：中文摘要过于简短，不符合规范。需阐述研究问题的意义与重要性，研究方法(包括样本)缺失，并补充研究结果的意义。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根据您的意见，我们重新撰写了中文摘要，在其中阐述了研究问题的重要性、注明了研究方法与样本量情况，并补充了研究结果的意义。修改后的摘要如下所示：

“募捐信息设计是促进个体捐赠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以往缺乏对求助者境况的不同描述如何影响募捐效果的研究，本研究从“动态视角”将募捐信息区分为“恢复/重建”和“改善/提高”两类。通过 1 个二手数据($N = 978$)和 7 个实验($N = 1452$)发现上述信息分类合理(二手数据)，且在现实和人们记忆中，“恢复/重建”与不可控事件、“改善/提高”与可控事件更常同时出现(二手数据、实验 1)。“恢复/重建”(vs.“改善/提高”)类描述让人感知更有利于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实验 2a、2b)，且不可控(vs.可控)事件导致个体更关注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实验 3)。基于调节焦点的匹配，不可控事件采用“恢复/重建”(vs.“改善/提高”)类描述，可控事件采用“改善/提高”(vs.“恢复/重建”)类描述，个体捐赠意愿更高(实验 4a、4b)，该效应被投入感所中介(实验 5)。本文对推进慈善劝捐领域研究有理论贡献，且在指导慈善组织合理设计募捐信息方面具有实践价值。”

意见 2: 按照规范, 在全文最后补充研究结论, 且研究结论应该是整个研究得出的总体结论, 而不是各子研究结果小结。

回应: 感谢您的重要意见。基于您的建议, 我们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整体性总结, 具体如下所示:

“本文通过 1 个二手数据研究和 7 个实验, 探讨了以“恢复-改善”框架对募捐信息进行分类的合理性及其对募捐效果的影响, 得到以下结论: (1)募捐信息按照对求助者境况变化的不同描述, 可以区分为“恢复/重建”和“改善/提高”两种类别; (2)针对不可控事件, “恢复/重建”(vs. “改善/提高”)劝捐效果更好, 针对可控事件, “改善/提高”(vs. “恢复/重建”)劝捐效果更好; (3)该效应是因为不可控(可控)事件导致个体更关注减少损失(增加获得), 而“恢复/重建”(“改善/提高”)类描述让人感知更有利于减少损失(增加获得), 事件可控性和募捐信息类型在调节定向上的匹配提高了个体的投入感, 进而提升了捐赠意愿。”

(请见正文“9 研究结论”)

意见 3: 讨论, 缺少核心内容, 未针对研究的结果, 展开与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的比较与分析。需补充该部分内容。“实践启示”第二段, 其中涉及的内容与论文研究无直接关系, 建议删除。研究不足中提到“其次, 研究均通过在线虚拟实验”, 在前文研究设计并未报告。

回应: 感谢专家的细致审阅与宝贵建议, 以下为针对上述问题的一一回复:

1. 理论贡献部分, 根据审稿老师的建议, 我们适当展开了对相关研究的比较和分析。

(1) 募捐信息分类方面, 阐明了以往研究多基于静态视角从受益人(White & Pelozo, 2009)、框架效价(Chang & Lee, 2009)、强调个体人道或群体规范(Smith et al., 2014)、凸显情感或功能益处(Moran & Bagchi, 2019)、使用享乐品或实用品作为参照(Savary et al., 2014)等维度进行过划分, 但尚未有研究从动态视角对求助者境况进行过特别关注。

(2) 补充了事件可控性的相关研究结论, 指明其对个体帮助他人的责任感(Winterich & Zhang, 2014)、救助意愿(Zagefka & James, 2015)及对实施捐赠行为的企业评价(Hildebrand et al., 2017)的影响, 从而突出在慈善募捐背景下对该因素进行深度探索的必要性。

(具体修改请见正文“8.1 理论贡献”蓝色字体处)

2. 实践启示部分, 经您提示对第二段内容进行检查, 确实与本研究无直接关系, 已根据建议将此段删除。

3. 研究不足部分, 针对“在线虚拟实验”的问题, 我们在修改稿的每个实验中均写明了被试是通过何种形式完成实验的。同时, 我们还爬取了“支付宝公益平台”的二手数据,

对真实募捐信息与数据进行了分析，以对研究假设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具体修改请见正文“**2 二手数据：信息分类合理性及其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

涉及的参考文献：

- Chang, C. T., & Lee, Y. K. (2009). Framing charity advertising: Influences of message framing, image valence, and temporal framing on a charitable appeal.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9*(12), 2910–2935.
- Hildebrand, D., DeMotta, Y., Sen, S., & Valenzuela, A. (2017). Consumer responses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contribution typ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4*(4), 738–758.
- Moran, N., & Bagchi, R. (2019). The power of emotional benefits: Examining the role of benefit focus on donation behavior. *Journal of Advertising, 48*(3), 1–8.
- Savary, J., Goldsmith, K., & Dhar, R. (2014). Giving against the odds: When tempting alternatives increase willingness to donat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52*(1), 27–38.
- Smith, I. H., Aquino, K., Koleva, S., & Graham, J. (2014). The moral ties that bind even to out-groups: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moral identity and the binding moral foundat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8), 1554–1562.
- White, K., & Peloza, J. (2009). Self-benefit versus other-benefit marketing appeals: Their effectiveness in generating charitable support. *Journal of Marketing, 73*(4), 109–124.
- Winterich, K. P., & Zhang, Y. (2014). Accepting inequality deters responsibility: How power distance decreases charitable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1*(2), 274–293.
- Zagefka, H., & James, T. (2015). The psychology of charitable donations to disaster victims and beyond: The psychology of charitable donations.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9*(1), 155–192.

在研究逻辑与设计上：

意见 4：慈善募捐信息的“恢复和改善”分类是该论文的基本前提，但该分类的依据在理论和实证上依据不足。研究整体逻辑，尤其是研究 1，似乎在进行循环论证。如，研究 1 在材料中设置了划分为“恢复和改善”的慈善募捐信息，然后检验被试是否感知到了这种划分。但这种人为编制划分的实验材料不能代替存在的真实慈善募捐信息。在所有的慈善募捐信息中，有多少比例可以按照该框架划分，有多少不能？论文需要补充充分的直接证据，如增加一个研究，证明这种分类的充分性。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以下为对上述问题逐一回复：

1. 作为本研究的基本前提，将募捐信息划分为“恢复/重建”与“改善/提高”两类的依据需要阐明。我们基于现有文献，结合对现实情况的观察与思考，对该分类框架进行了更清晰地界定，对两类信息的操作性定义作了适当修改，并重新画了信息分类示意图。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所示：

“如图 1 所示，从时间的动态变化维度看，“恢复/重建”类描述涵盖了求助者境况由好

及坏的过程，强调帮求助者由损失状态恢复至原状(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比如，求助者生活突遭变故、境况急转直下，呼吁人们帮其重返昔日美好生活，如支援灾区重建、帮助学生重返校园等。然而，“改善/提高”类描述则不涉及求助者境况如何变差的过程，其重点在于对求助者较差现状的描述和人们可以帮助他们改善现状上，强调使求助者较差的现状变得更好(现在到未来)。例如，求助者生活贫苦，请求人们帮其改善生活条件、提升对未来的希望等。此外，从语义层面也可以发现二者差异。中文里复苏、复兴、康复等带“复”的词语，本身便有还原、重新、再度等含义，强调从差的现状还原为好的过去，包含时间上的前后落差和未来转变过程；而改善、提高等词给人以向更好未来发展的直觉，时间上不包括对过去的回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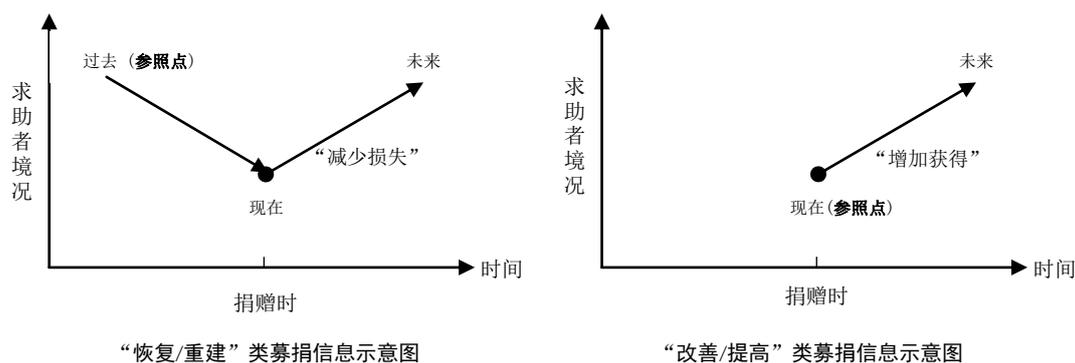


图 1 两类募捐信息示意图

(请见正文“1.1 募捐信息类型：感知功能的差异”第 2 段)

2. 关于循环论证问题的回复与修改如下：

(1) 参考 Bhattacharjee 和 Mogilner (2014) 的方法，我们开展实验的内在逻辑为，首先在实验 1 中引导一批被试回忆其最近看到的以恢复或改善为主题的募捐信息，并对信息类型操控进行检验；之后在实验 2b 中，换一批被试对从实验 1 中抽取的募捐信息进行区分。利用这种做法，可以确认即便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个体也可以对他人回忆中的募捐信息类型进行正确区分，进一步说明信息分类的合理性。

(2) 此外，为了对“恢复—改善”分类标准的合理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我们增加了实验 2a，利用从“支付宝公益平台”爬取的真实募捐信息作为实验材料，再次确认被试可以正确区分两类信息(具体请见正文“4.1 实验 2a：基于真实募捐信息操控募捐信息类型”)。

3. 我们非常认同您提出的需要有研究来证明该分类标准充分性的建议。因此，我们增加了 1 项二手数据研究，从“支付宝公益平台”爬取了真实的募捐信息，以确认信息分类的合理性。对真实募捐信息的编码结果显示，二手数据中可以按照“恢复—改善”框架进行分类的信息比例为 24.34%(238/978)。需要说明的是，在对二手数据的信息类型进行编码时，我们仅关注一条信息单独强调“恢复/重建”或“改善/提高”的情况。对于一条募捐信息同时混杂两类描述的情形，我们没有对此进行研究。同时，我们还利用二手数据对募捐信息类

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关系和匹配效应进行了初步探索(具体请见正文“2 二手数据：信息分类合理性及其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与附录 1 中的“3 二手数据：匹配对捐赠意愿的提升作用”)。

涉及的参考文献：

Bhattacharjee, A., & Mogilner, C. (2014). Happiness from ordinary and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1(1):1–17.

意见 5：提出假设 2 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关注点”的具体定义是什么？建议可以从损失规避、决策中的序列效应的角度补充适宜的理论依据，而不是停留在主观演绎的层面。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提出此条意见和建议，审稿专家不仅提出了修改意见，还提供了相关理论依据，对此我们深表感激。

参考您的建议，我们借用损失规避的理论视角，对假设 H2 进行了修改，对其推理过程进行了重新演绎，具体内容如下：

“基于两类募捐信息强调重点的不同，个体感知慈善项目的功能也不同。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相关研究认为影响个体决策的并非最终结果而是其相对于参照点的变化(Kahneman & Tversky, 1979)，提出损失(Loss)与收益(Gain)均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个体会根据不同参照点将某种结果知觉为损失或收益 (Kahneman & Knetsch, 1991)。两类募捐信息不同的强调重点，代表二者对求助者境况变化过程的描述依赖的参照点不同，所以其对损益的关注点也不同，进而导致个体感知到慈善项目的功能也不同。“恢复/重建”类描述对求助者境况由好及坏过程的强调，是以“好的过去”为参照点来对比“差的现状”，因此其更强调求助者在此次变故中的损失，以及捐助者的捐赠可以帮助求助者减少损失(Focus on loss)。然而，“改善/提高”类描述强调的是使求助者境况由较差的现状向好的未来发展，即以“差的现在”为参照点来对比“好的未来”，因此该类描述强调捐助者的捐赠可以为求助者增加获得(Focus on gain)。据此，我们假设：

H2：“恢复/重建”(vs.“改善/提高”)类描述更让个体感知到慈善项目可以帮助求助者减少损失；“改善/提高”(vs.“恢复/重建”)类描述更让个体感知到慈善项目可以帮助求助者增加获得。”

(请见正文“1.1 募捐信息类型：感知功能的差异”第 3 段)

涉及的参考文献：

Kahneman, D., & Knetsch, J. L. (1991). The endowment effect, loss aversion, and status quo bia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1), 193–206.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2),

意见 6: 慈善募捐信息的“恢复-不可控, 改善-可控”的关系是全文的核心理论假设, 但文章对该关系的理论推演逻辑不够清晰, 依据显得较不充分?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指出。在修改稿中, 我们根据调节匹配理论, 基于募捐信息的慈善功能(减少损失 vs. 增加获得)与受事件可控性影响的个体关注点(减少损失 vs. 增加获得)在调节焦点上的一致性, 对“恢复—不可控, 改善—可控”的对应关系进行了更清晰的逻辑推演, 并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

在假设 2 中, 我们已经论述了“恢复/重建”与“改善/提高”两类募捐信息慈善功能的差异。具体而言, “恢复/重建”(vs. “改善/提高”)类描述更让个体感知到慈善项目可以帮助求助者减少损失; “改善/提高”(vs. “恢复/重建”)类描述更让个体感知到慈善项目可以帮助求助者增加获得。

现在, 我们在假设 3 中论述事件可控性对个体关注点的影响, 相对而言, 个体在事件不可控(vs. 可控)时更关注减少损失, 而在事件可控(vs. 不可控)时更关注增加获得(**详细理论推演请见正文“1.2 事件可控性: 个体关注点的差异”第 3、4、5 段**)。

意见 7: 文中涉及的几个核心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如:

a) 困境原因可控性(Controllability of the cause of the plight), 该表述是否作者本人提出? 在 Google Scholar 中, 用“Controllability of the cause of the plight”无法搜到符合的文章, 用“Controllability”+“cause of the plight”, 也只能查到三篇文章, 但无一与该名词定义的“指求助者处于困境的原因是否属于人类可控范围(Brewin & Shapiro, 2011; Brickman, 1982)”中的两篇参考文献符合。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细心审阅与提问。在修改稿中, 我们将“困境原因可控性”这一表述修改为“事件可控性”, 并对其概念进行了更清晰的界定, 具体修改如下所示:

“事件可控性指是否存在某些人类主体可以控制该事件的发生(Hildebrand et al., 2017; Winterich & Zhang, 2014)。换句话说, 导致困境的事件有可能是源于人类行为, 也有可能是因为超越人类的自然或偶然因素导致的。比如火灾给求助者造成的困境既可以由野炊、烧荒等人为因素导致, 也可因高温干旱等自然原因发生。”

(具体修改请见正文“1.2 事件可控性: 个体关注点的差异”第 1 段)

涉及的参考文献:

Hildebrand, D., DeMotta, Y., Sen, S., & Valenzuela, A. (2017). Consumer responses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contribution typ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4(4), 738-758.

Winterich, K., Mittal, V., & Aquino, K. (2013). When does recognition increase charitable behavior? Toward a moral identity-based model. *Journal of Marketing*, 77(3), 121–134.

b) 不可控的具体定义和范围？不可控指对受捐者不可控还是对于捐助者不可控？慈善捐助中疾病经常出现，是可控还是不可控？贫穷呢？因病致贫呢？在 1.2 中，主要论述是对个体自身不可控时的情况，整个推理是基于自己的角度。但是对于受捐助者可控的因素，对于观察者/捐助者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可控因素。但在实验 3 中实验材料中的可控条件，对于接受捐赠的人又不是可控的。且观察他人 vs 自己的决策存在 self-other 差异。此时在观察或为他人决策的时候，心理距离增加，可能机制并不相同。此时是否假设 3 依然成立？

回应：非常感谢您建设性的提问与意见，引发了我们对研究中核心概念的深度思考，对我们界定概念范围和完善理论逻辑有重大意义！以下为针对上述问题的一一回复与修改：

1. 我们在修改稿中除了阐述事件可控性的定义之外，还划定了可控与不可控的范围，具体如下：

“需要明确的是，事件可控性在此特指导致求助者困境的事件是否存在能影响该事件发生的人类主体，可控性感知决定了个体认为一个事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预见或者可预防的(Alicke, 2000)。本文并不对涉及的人类主体加以限制，也不讨论事件导致的困境后果是否可控。同以火灾为例，本文关心引起火灾的事件是否人为可控，而不关心求助者是否应对本次火灾的发生而负责，亦不关心灾情是否可控。”

(请见正文“1.2 事件可控性：个体关注点的差异”第 1 段)

2. 本研究讨论的可控性指导致求助者困境的事件是否存在能影响该事件发生的人类主体，并不对涉及的人类主体加以限制，故此处的不可控对于受捐者和捐助者而言，均是不可控的。

3. 参考本研究对事件可控性的定义，针对疾病、贫困及因病致贫的情况，无法直接判断其是否可控，而需要根据具体情境描述来判定导致疾病或贫困的事件是否存在能影响该事件发生的人类主体。例如，在实验 1 引导被试回忆的募捐信息中，便有同为疾病但事件可控性不同的描述：一名同学因为多吃垃圾食品得了白血病(人类主体导致，可控)；一位朋友突然生了白血病(偶然因素引发，不可控)；一位老师身患重病(未明确)。

4. 审稿专家对于决策过程中自我与他人差异的思考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如您所言，有些对于捐助者而言可控的因素，对于观察者或求助者而言是不可控的。不过，在本研究中，讨论的可控与否均是指导致求助者困境的事件是否存在能影响该事件发生的人类主体。简言之，只要存在能影响该事件发生的人类主体，在本文中即是可控的。

综上，在您的启发下，我们进一步厘清了事件可控性的定义与范围，有助于将理论逻辑论述得更为清晰。

c) 对于恢复和改善组的定义与操作不够清晰。实际上，恢复组是恢复+改善，而不是完全没有改善。如在实验 1 中，改善组和恢复组对提高生活水平的评分都大于 5，说明两组认为不同类信息都可以起到改善的作用。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与意见 4 的回复一致，我们对两类募捐信息进行了重新定义，募捐信息的目的均在于帮助求助者改善现状，而“恢复/重建”类信息则另外包含了恢复功能(具体请见正文“1.1 募捐信息类型：感知功能的差异”第 2 段)。

意见 8：引言部分最后一段提出了 4 个研究问题，其中问题 1 和问题 4 的界定不够清晰，如果问题 1 中的“是否有效”指的是有效促进捐献意愿的话，二者是否等价？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意见。问题 1 中的“是否有效”是指以“恢复—改善”框架对募捐信息进行划分是否合理，而非能否有效促进捐赠意愿；问题 4 指的是能否促进捐赠意愿。我们对研究问题的阐述不够清晰，已作出修改，修改后的研究问题如下所示：

“(1) 募捐信息是否可以被个体按照“恢复/重建”与“改善/提高”的框架加以区分？ (2) 不同类型的募捐信息如何影响慈善项目的感知功能？ (3)事件可控性如何影响个体关注点？ (4)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能否提升个体捐赠意愿？ (5)内在机制如何？”

(请见正文“1 引言”第 3 段)

在研究方法与结果部分：

意见 9：在样本选择上，研究 1、3 中被试中包括了未成年被试，是否符合伦理要求？

回应：感谢您的悉心指正。对于实验被试选择问题，未严格控制年龄要求，的确是我们的疏忽。不过，本研究开展的实验均为慈善募捐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和网络会上会经常遇到的情景，不会涉及伦理道德和引发被试产生不适感的问题。

我们在此次修改过程中，剔除了实验 1 的未成年被试，其余样本的数据结果仍支持实验结论，同时改进并替换了实验 3。此外，本次修改中新开展的所有实验，均对被试年龄进行了严格限制，确保不含未成年被试。

最后，我们在此后开展研究的过程中，会更加注意被试选择和其他伦理道德方面的考虑，确保研究的合情合理合法性，再次衷心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意见 10：研究 1，实验 1 的指导语需要报告。“将被试填写的慈善募捐情境分为 3 类：可控、不可控、未明确”，分类结果的数据未报告。研究一结论，“个体可以自然分辨“恢复/重建”类和“改善/提高”类慈善募捐信息”，但这并不是一个“自然分辨”的过程，而是在人为材

料中是否可以正确识别信息差异。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根据您的建议，我们进行了如下修改：

1. 在附录 1 中详细报告了编码指导语(请见“附录 1 二手数据材料”)。

2. 已在实验 1 中补充具体的分类结果数据：“具体的，在 88 条被试回忆的募捐信息中，可控事件 39 个，不可控事件 28 个，未明确 21 个。”

3. 对“自然分辨”这类表述进行删除处理。此外，我们增加了 1 项二手数据研究，确认在真实的材料中，被试也可以分辨两类募捐信息(具体修改请见正文“2 二手数据：信息分类合理性及其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

意见 11：实验 2，研究样本量估计部分，作者使用了 $f = 0.5$ 作为预设的效应量。但是该实验适用的成对样本 t 检验，对应的效应量应是 d 值，而不是 f 值。另外，作者选用 $f = 0.5$ 作为效应量的依据是什么？ $f = 0.5$ 应已经属于一个较大的效应，请作者核查是否将 d 值误报成了 f 值、以及选用该效应量的依据。“在实验 1 的“恢复/重建”类与“改善/提高”类慈善募捐信息中各随机抽取了 7 条”，是否应该是按照在恢复/改善维度的评分作为选择依据？实验二“对于每条慈善募捐信息，被试先判断其类别：“这个慈善项目将帮助求助者恢复往日的的生活状态还是改善现在的生活状态？”(1 = 恢复往日的的生活状态，7 = 改善现在的生活状态)”，将恢复和改善设置为单一维度上两端的依据是什么？按照实验一的结果，慈善捐助可能是双维的，尤其是恢复型情境可能是恢复-改善双重属性的。对关注点的测量存在同样问题，将实验一的双维改成了单维，缺乏依据。“将被试对“恢复/重建”类与“改善/提高”类慈善募捐信息的类别判断分别取均值”，此处请补充被试判断的一致性系数。“在实验 2 中，我们招募了一组不相关的被试(Outsiders)对来源于实验 1 的慈善募捐信息进行评价，结果证实个体能够正确区分他人回忆的不同类型的慈善募捐信息。”这里没有报告相应的数据，无法做出这个结论。

回应：感谢专家细致地指出实验中的各个问题。您的问题和意见对我们进行实验完善和补充有重要作用，以下为针对上述问题的一一修改与回应。

1. 效应量问题。经核查，针对实验 2 适用的成对样本 t 检验，对应的效应量应是 d 值，而非 f 值，非常感谢您的指正，我们已在正文中进行修改：“对本实验适用的成对样本 t 检验，在显著性水平 $\alpha = 0.05$ 且中等效应($d = 0.50$)时，预测达到 80% 的统计功效的总样本量至少为 34”。

2. 实验 2b 募捐信息选择标准问题。我们之前采用随机抽样原则抽取了实验材料，但确实未考虑到应该利用各条募捐信息在恢复/改善维度的评分作为选择依据。为了弥补实验材料选取不当的问题，我们增加了实验 2a，利用从“支付宝公益平台”爬取的真实募捐信息来操控募捐信息类型，并对信息的感知功能进行检验(请见正文“4.1 实验 2a：基于真实募

捐信息操控募捐信息类型”)。

3. 恢复/改善单维以及关注点单维问题。参考您的建议，为解决此问题，我们增加了实验 2a，对感知信息类型(“这个慈善项目将帮助求助者恢复往日的的生活状态/改善现在的生活状态”)与感知功能(“这个慈善项目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求助者减少损失/增加获得？” (Jain et al., 2007)”)均以双维度进行测量，以提升实验设计的严谨性。同时，实验 2a 与实验 2b 得出的结论一致，一定程度上说明即便使用单维测量方法也可以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具体修改请见正文“4.1 实验 2a: 基于真实募捐信息操控募捐信息类型”)。

4. 一致性系数问题。根据您的建议，针对取均值的每组数据，均已补充一致性系数(详细数据请见“表 3”与“表 4”)。

5. 经您提醒对该句进行检查，如此表述确实不恰当，已删除，感谢您的指正。

涉及的参考文献：

Jain, S. P., Lindsey, C., Agrawal, N., & Maheswaran, D. (2007).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Valenced comparative frames and regulatory focu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4(1), 57–65.

意见 12: 实验 3, “使用与慈善捐赠完全无关的方式来测量被试当下的关注点”, 这种操作比较令人费解, 为什么使用对无关情景的关注点, 而不是对慈善捐赠的关注点? 为什么认为无关情景的关注点可以产生影响? 这种假设后隐含的逻辑是关注点的作用是弥散性跨情景的?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设性提问与意见。此前使用与慈善捐赠完全无关的方式来测量被试当下的关注点, 本意在于探索被试在面对到可控/不可控事件时, 会对其当下关注点产生何种无意识的影响。然而, 却忽略了募捐信息对个体捐赠行为的影响应该是基于情境的。募捐信息背景中的事件可控性影响了个体当下对该慈善项目的关注点, 进而才能对个体后续捐赠意愿产生影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重新设计实施了一个实验, 替换了原有的实验 3。对于关注点的测量, 直接使用了与慈善捐赠相关的问题, 且采用双维度进行测量: “在阅读这则微博时, 您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如何帮助岭口镇减少损失/增加获得? (1 = 非常小的程度, 8 = 非常大的程度; Jain et al., 2007)”。通过对实验 3 的重新设计, 确认了事件可控性对个体关注点的影响: 相对而言, 个体在事件不可控(vs.可控)时更关注减少损失, 而在事件可控(vs.不可控)时更关注增加获得(请见正文“5 实验 3: 事件可控性影响个体关注点”)。

涉及的参考文献：

Jain, S. P., Lindsey, C., Agrawal, N., & Maheswaran, D. (2007).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Valenced comparative frames and regulatory focu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4(1), 57–65.

意见 13: 研究 4, 研究 4a 和 4b 唯一的差异在于使用的情景问题不同, 建议二者可以合并为一个研究。所有组间设计的实验部分, 需报告各组的样本量及样本同质性。图 3~5, 需标注 *SD* 或 *SE*。“具体的组间对比显示(图 4)”, 需报告具体统计名称。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与细心指正。以下为针对上述问题的一一回复:

1. 参考审稿老师的建议, 我们将原实验 4a 与实验 4b 合并为现实实验 4a。现在的实验 4a 为 2(困境原因可控性: 不可控 vs. 可控) × 2(慈善募捐信息类型: 恢复/重建 vs. 改善/提高) × 2(灾害情境: 洪灾 vs. 火灾) 组间设计, 实验结果仍支持假设 H4。同时, 由于洪灾情境与火灾情境的数据于不同时间收集, 我们在正文中说明了此点, 并保留了两个情境下分别对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效应的分析结果(具体修改请见“6.1 实验 4a: 灾害救助情境”蓝色字体处)。

2. 我们在实验 1 与实验 3 中汇报了分组样本量, 但是由于实验 4a、实验 4b 与实验 5 的组别较多, 不便在正文中逐一汇报, 所以在此汇总了各涉及组间实验的样本量与样本同质性情况。如下所示:

表 1 样本量与样本同质性检验

实验	实验分组	样本量	样本同质性检验	
			性别(女)	年龄
实验 1	“恢复/重建”	40	27(67.5%)	23.8(3.25), 18~33
	“改善/提高”	48	28(58.3%)	23.4(2.96), 18~32
			$\chi^2(1) = 0.78, p = 0.254$	$F(1, 86) = 0.45, p = 0.503$
实验 3	不可控	67	44(65.7%)	28.94(8.80), 18~66
	可控	70	42(60.0%)	28.22(6.86), 18~55
			$\chi^2(1) = 0.47, p = 0.492$	$F(1, 135) = 0.28, p = 0.596$
实验 4a	“恢复/重建”-不可控-洪灾	57	45(78.9%)	24.68(5.26), 20~46
	“改善/提高”-不可控-洪灾	45	36(80.0%)	23.00(1.85), 20~25
	“恢复/重建”-可控-洪灾	54	33(61.1%)	23.83(2.68), 20~30
	“改善/提高”-可控-洪灾	69	45(65.2%)	24.70(2.37), 20~31
	“恢复/重建”-不可控-火灾	57	36(63.2%)	25.16(4.44), 19~37
	“改善/提高”-不可控-火灾	54	32(59.3%)	25.00(4.96), 18~39
	“恢复/重建”-可控-火灾	51	32(62.7%)	24.69(4.13), 18~35
	“改善/提高”-可控-火灾	53	31(58.5%)	24.60(4.05), 18~37
			$\chi^2(7) = 11.64, p = 0.113$	$F(7, 432) = 1.60, p = 0.134$
实验 4b	“恢复/重建”-不可控	80	49(61.3%)	25.89(4.55), 19~37
	“改善/提高”-不可控	86	59(68.6%)	24.99(4.66), 18~39
	“恢复/重建”-可控	68	33(48.5%)	25.35(4.86), 18~39
	“改善/提高”-可控	83	44(53.0%)	25.83(5.03), 18~37
			$\chi^2(3) = 7.67, p = 0.053$	$F(3, 313) = 0.66, p = 0.579$
实验 5	“恢复/重建”-不可控	74	40(54.1%)	27.85(5.57), 18~44
	“改善/提高”-不可控	73	44(60.3%)	27.79(7.27), 19~50
	“恢复/重建”-可控	69	43(62.3%)	28.36(6.84), 19~53
	“改善/提高”-可控	73	44(60.3%)	29.68(9.15), 18~58
			$\chi^2(3) = 1.16, p = 0.763$	$F(3, 285) = 1.06, p = 0.369$

3. 文中涉及组间对比图的部分, 均补充标注了 SE 线(请见“图 3~8”)。

4. 涉及到“具体的组间对比”的部分，现已写明具体统计名称：“简单效应分析”。

此外，文中存在多处报告不规范，如：

意见 14：文中各涉及置信区间部分的报告内容均不规范。如“相较于困境原因不可控组被试($M_{\text{不可控}} = 3.63, SD = 1.53$), 困境原因可控组被试($M_{\text{可控}} = 5.79, SD = 1.25$)更倾向于认为此次灾害发生的原因是人为可控的, $F(1, 223) = 135.36, p < 0.001, 95\%CI: [1.79, 2.52], \eta^2 = 0.38$ ”，这里报告的置信区间指的是哪个变量的置信区间？

回应：感谢您的耐心指正。此处应为针对感知事件可控性，不可控组被试与可控组被试的差值的置信区间。参考您的意见，我们对文中所有置信区间进行了重新计算与检查核对，对于报告不规范的部分，均已作出修改(参见各实验的数据分析报告)。

意见 15：多处可见参考文献标注不规范。包括但不限于：

a) “《2019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我国当年人均捐赠额为 107.81 元，同比增长 4.3%，而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 8.9%”，未附上数据来源的参考文献；

回应：感谢您的指出。我们对数据来源进行核查，发现原汇报数据有误，现已在正文中作出更正：“《2019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我国当年人均捐赠额为 107.81 元，比 2018 年增加 4.5%，低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的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8%”。同时，已将数据来源网址以尾注形式在文中注明。

b) 原始文献年代有误，如“Brewin, C., & Shapiro, D. (2011). Beyond locus of contro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outcom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75(1), 43 - 49.”同名文献发表年代是 1984 年。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正。经核查，这篇文献的发表年代为 1984 年。未明确核对每篇参考文献是我们的疏忽，我们已在正文中更正且对其余参考文献进行了核查。

c) 引用综述需注明，如“救灾方面研究表明，自然灾害比人为灾害得到了更多人的救助与支持(Zagefka & James, 2015)”

回应：感谢您的指出。我们已在正文中对该问题作出修改：“救灾方面的研究显示，自然灾害比人为灾害得到了更多人的救助与支持(详见综述 Zagefka & James, 2015)”。

d) 请核查文献，是否该文献提出该理论。如可能，最好注明具体页码。“面对不可控原因导致的困境时，个体会更加关注损失及如何减少损失。相反，若个体身处的环境是由可控原因形成时，其便会将注意力集中至具体的情境细节，同时产生积极的心理暗示与情绪(Ross et al., 2002)”。

回应：感谢您的悉心指正。我们对这篇文献进行了核查，发现并非由该文献提出该理论，已将该部分内容删除。在新的修改稿中，我们对引用的文献进行了更严格的核查。

.....

审稿专家 2 意见：

本研究关注了慈善信息类型、灾难发生是否是人为导致等因素对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将慈善信息分为“恢复/重建”和“改善/提高”两类具有一定的新意，并通过六个实验对研究问题进行了探索，工作量较大。但是文章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对本文研究视角和工作量的肯定！

意见 1： 作者认为：“恢复/重建”类信息是强调境况由好及差，“改善/提高”类信息强调境况由差向好。不知为何要做如此定义。既然是慈善捐款肯定是改善现状，一般也都是帮助别人由差到好，只是参照点不同才导致了两类信息的存在，即“恢复/重建”应该强调的是由损失恢复到原状，改善/提高”则是由较差的现状变得更好。作者的操作定义存在问题，建议重新对两类信息加以定义。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我们十分同意审稿老师的看法，将募捐信息按照“恢复—改善”框架进行分类是基于二者对求助者境况变化过程的描述所选取的参照点不同。与对审稿专家 1 的意见 7c 的回复相同，我们在正文中对两类募捐信息的操作定义作出了更加清晰的界定(具体修改请见正文“1.1 募捐信息类型：感知功能的差异”第 2 段)。

意见 2： 作者用了六个实验来验证自己的假设，但是里面包含了三个重复实验，本质上是四个实验，但是者四个实验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实验 1 感觉更像一个预实验，实验 2 和实验 3 涉及的因变量都是关注点，并未涉及捐赠行为，那么关注点与捐赠行为之间是否有关系呢？并没有搞清楚。实验 4 才真正关注了捐款行为。

回应：特别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在本次修改过程中，我们新增了 1 个二手数据研究，补充了 2 个新的实验(实验 2a 与实验 5)，重新设计实施并替换了实验 3，并将原实验 4a 与实验 4b 合并为现实验 4a。目前，本研究共有 1 个二手数据研究和 7 个(5 组)实验。修改之后的研究框架与实验逻辑图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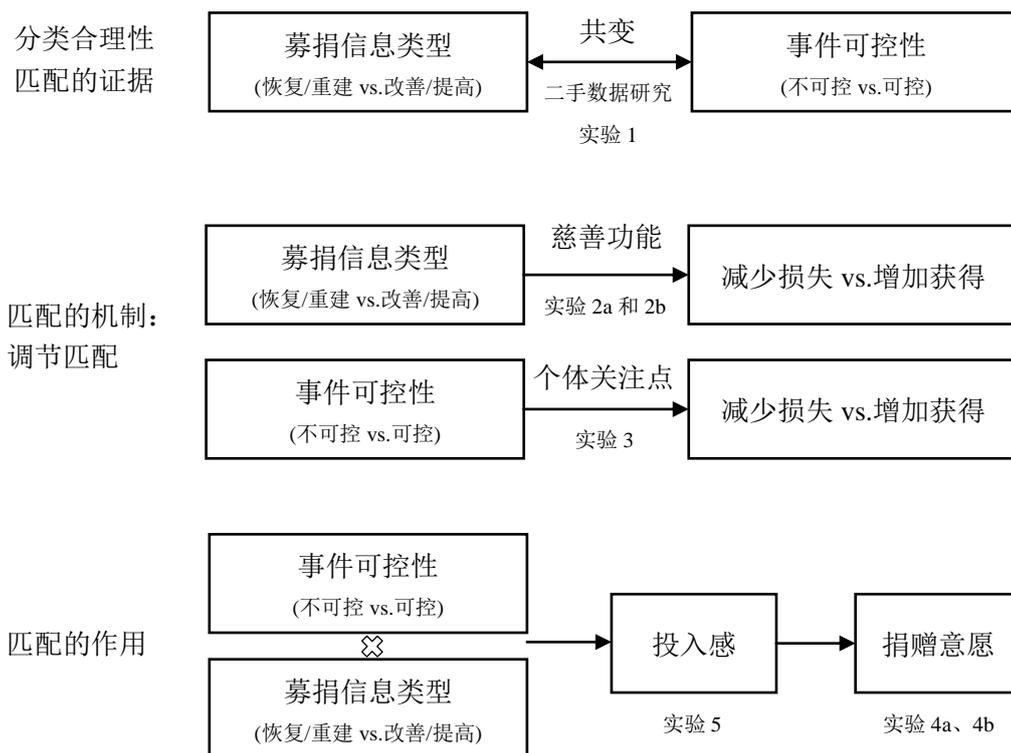


图2 研究框架与实验逻辑

此外，我们在讨论中也详细阐述了各实验之间的逻辑关系。具体如下所示：

“本研究将募捐信息区分为“恢复/重建”与“改善/提高”两类，并基于调节匹配理论探索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对个体捐赠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通过用1个二手数据分析和7个实验发现：首先，上述对募捐信息的分类是合理的(二手数据)，并且在现实募捐信息和人们的记忆中，“恢复/重建”与不可控事件、“改善/提高”与可控事件更常同时出现(二手数据、实验1)。然后，“恢复/重建”(vs.“改善/提高”)类描述让人感知更有利于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实验2a、实验2b)，且不可控(vs.可控)事件导致个体更关注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实验3)，说明在调节定向上存在募捐信息类型和事件可控性的匹配。最后，基于调节焦点的匹配，不可控事件采用“恢复/重建”(vs.“改善/提高”)类描述，可控事件采用“改善/提高”(vs.“恢复/重建”)类描述，个体捐赠意愿更高(实验4a、实验4b)，该效应被投入感所中介(实验5)。”

(请见正文“8 讨论”第1段)

意见3：实验1是通过记忆任务完成的，由于是在线实验，如何保证被试回忆了相关信息而不是在做实验时当场查阅的？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指出。我们承认在线实验具有其局限性，即便在明确告知被试需要独立

完成实验的情况下,仍然无法保证其确实回忆了相关信息而非在做实验时当场查阅的。然而,实验 1 旨在检验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之间的共变关系,即使实际过程中被试使用在线查阅的募捐信息也并不影响研究结论。

意见 4: 实验 2 中对关注点的探测只是通过一个问题来询问,方法上值得商榷。实验 3 中对关注点的探测又变成了“酸奶”广告任务,那么“酸奶”广告与之前的慈善情境有何联系?作者为何这样设计因变量的测量?并没有交代理由。这种测量是否准确,也值得商榷。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专心细致地指出实验设计的问题。以下为针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复:

1. 实验 2 测量问题。损失与获得属于两个不同维度,而我们在实验 2b(原实验 2)中将其设置为单维度问题进行测量确实欠缺考虑。为解决该问题,我们在新增的实验 2a 中,将损失与获得作为两个问题分开进行测量:“这个慈善项目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求助者减少损失/增加获得?(1 = 非常小的程度,8 = 非常大的程度; Jain et al., 2007)”,以确认两类募捐信息的感知慈善功能不同(请参见正文“4.1 实验 2a: 基于真实募捐信息操控募捐信息类型”)。

2. 实验 3 关注点测量问题。您的这条意见与审稿专家 1 的意见 12 不谋而合。综合审稿专家们的意见,我们意识到之前忽略了若要使募捐信息对个体捐赠产生影响,则其对个体关注点的影响应该是基于慈善捐赠情境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实验替换了原有的实验 3。对于关注点的测量,直接使用了与慈善相关的问题:“在阅读这则微博时,您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如何帮助岭口镇减少损失/增加获得?(1 = 非常小的程度,8 = 非常大的程度; Jain et al., 2007)”。通过对实验 3 的重新实施,确认了事件可控性对个体关注点的影响:相对而言,个体在事件不可控(vs.可控)时更关注减少损失,而在事件可控(vs.不可控)时更关注增加获得(请参见正文“5 实验 3: 事件可控性影响个体关注点”)。

涉及的参考文献:

Jain, S. P., Lindsey, C., Agrawal, N., & Maheswaran, D. (2007).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Valenced comparative frames and regulatory focu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4(1), 57–65.

意见 5: 研究中,多次使用“这个慈善项目将帮助求助者恢复往日的的生活状态还是改善现在的生活状态?(1 = 恢复往日的的生活状态,7 = 改善现在的生活状态)”,这样的测量存在问题,因为“恢复往日的的生活状态”与“改善现在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一个维度上的。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对关注点的测量上。

回应: 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和细致指正。对于恢复/改善程度和关注点的单维测量问题,我们作出了相应修改。为解决该问题,我们在新增的实验 2a 中将恢复/改善、减少损失/增加获得均以双维度进行测量,以提升实验设计的严谨性。同时,实验 2a 与实验 2b 得出的结论一致,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单维测量方法也可以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此外,在实验 5 中也采

用双维度对慈善募捐信息的强调重点进行了测量(具体修改请见正文“实验 2b”和“实验 5”)。

意见 6: 实验 4 中涉及了三个情境, 这三个情境有何区别和联系, 作者并未交代清楚。

回应: 感谢您提出此条意见。实验 4 分别在洪灾救助、火灾救助和疾病帮扶情境下, 验证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对个体捐赠意愿的提升作用。三个情境均是现实中慈善捐赠的常见情境, 前两个情境属于灾害救助领域, 后一个情境属于疾病帮扶领域, 在不同情境下反复对该匹配效应加以验证, 可以增强研究的外部效度。由于洪灾救助和火灾救助同属灾害救助领域, 为简化论文, 我们对前两个情境进行了合并, 即将原实验 4a 与实验 4b 合并为现实实验 4a(具体修改请见“6.1 实验 4a: 灾害救助情境”蓝色字体处)。

意见 7: 该研究揭示了信息要素之间的匹配效应对说服效果影响, 但是这只是揭示了一个现象, 为何出现这种现象, 并没有探索。也就是说, 整个研究并没有对心理机制进行探索, 只是在综述部分提到了调节定向理论, 但是研究中并未对被试的调节定向取向进行测量。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建设性的意见和宝贵建议。以下为针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复:

1. 参考您的建议, 我们对信息要素之间的匹配效应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探索, 提出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对个体捐赠意愿的提升作用被投入感所中介(具体请见正文“1.3 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调节匹配”第 2、3 段)。

同时, 新增了实验 5 验证了投入感确实在该匹配效应中起中介作用(具体请见正文“7 实验 5: 投入感的中介作用”)。

2. 关于调节定向的问题。我们在实验 5 中测量了每个被试的调节定向取向并在数据分析时将其纳入为控制变量。

意见 8: 文章还存在一些小问题, 例如, 在计算样本量时, 有时 $f = 0.5$, 有时 $f = 0.25$ 。另外还包括语句不通, 修改痕迹未删除干净等问题。建议作者重新修改论文, 保证行文质量。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正和叮嘱。

1. 针对样本量计算时的效应量选择问题, 经核查, $f = 0.5$ 处属于误报, 此处效应量应为 d 值。我们已在正文中进行更正, 且对全文数据报告进行了详细的核验检查, 确保数据结果的准确性。

2. 对于语句不通、修改痕迹未删除等问题, 我们对文章进行了反复阅读和校对审阅, 尽量减少格式与文字错误, 力求全文逻辑连贯、行文流畅。衷心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

审稿专家 3 意见：

该研究对募捐行为做了细化的研究，把募捐的目的分为恢复(负向框架)以及改善(正向框架)，并且把需要募捐的对象所受的困境分为了可控与不可控两类。研究发现，困境原因不可控时，“恢复/重建”导致更高捐赠意愿；反之，困境原因可控时，“改善/提高”导致更高捐赠意愿。

本文对国内外文献的综述翔实，实验设计清晰合理，数据与结论可靠。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对于本研究理论梳理和实验设计的肯定！

意见 1：以下部分需要改正：

第五页：H1：慈善募捐信息可以分为“恢复/重建”类和“改善/提高”类。H1 不是一个假设。H2：两类慈善募捐信息的差异在于关注点的不同：相对而言，“恢复/重建”类信息关注减少损失，而“改善/提高”类信息关注增加获得。H2 应改为操作化的语句提出研究假设。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宝贵建议。参考您的建议，我们对研究假设作出了如下修正：

1. 假设 1 修改为：“个体可以区分‘恢复/重建’类和‘改善/提高’类募捐信息描述”。
2. 将假设 2 改为相对操作化的语句：“‘恢复/重建’(vs. ‘改善/提高’)类描述更让个体感知到慈善项目可以帮助求助者减少损失；‘改善/提高’(vs. ‘恢复/重建’)类描述更让个体感知到慈善项目可以帮助求助者增加获得。”。

第二轮

审稿专家 1 意见：

作者很好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增加的二手数据研究和 3 个新实验较好地弥补了上一版中的不足，为研究结果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建议小修后发表。文中尚有几处瑕疵，建议修改并完善。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于我们上一轮修改内容的肯定！您详尽细致的修改意见与建议为我们进一步完善论文提供了巨大帮助。以下是我们针对本轮每条修改意见所作的详细说明。

意见 1：中文摘要部分，1)对研究问题的意义概括不够清晰，尤其是研究问题的理论价值。“以往缺乏对求助者境况的不同描述如何影响募捐效果的研究”，这句话建议修改。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修改了中文摘要的研究意义部分，其中对研究问题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更加清晰的概括。

同时，我们对“以往缺乏对求助者境况的不同描述如何影响募捐效果的研究”这句话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内容为：“作为募捐信息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求助者境况的不同描述理应影响募捐效果却未引起学者关注。”

(具体修改请见正文“摘要”蓝色字体处)

意见 2：1 个二手数据和 7 个实验，建议统一编号为研究 1-5，否则容易混淆(研究 1 并非实验)。并修改各研究的标题，直接标出研究编号，如“2 二手数据：信息分类合理性及其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可修改为“2 研究 1 二手数据：信息分类合理性及其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重要建议。参考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将原“1 个二手数据和 7 个实验”统一编号为研究 1-6，其中研究 3 包含 3a 与 3b、研究 5 包含 5a 与 5b。6 个研究的编号与标题如下表所示：

表 1 各研究编号与标题

编号	标题
研究 1	研究 1 二手数据：信息分类合理性及其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
研究 2	研究 2：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
研究 3	研究 3：募捐信息类型影响感知强调点
研究 4	研究 4：事件可控性影响个体关注点
研究 5	研究 5：匹配对捐赠意愿的提升作用
研究 6	研究 6：投入感的中介作用

意见 3：几个假设的表述不够规范，建议修改为对假设变量间关系的直接描述。如：“H1：个体可以区分“恢复/重建”类和“改善/提高”类募捐信息描述。”“H2：“恢复/重建”(vs. “改善/提高”)类描述更让个体感知到慈善项目可以帮助求助者减少损失；“改善/提高”(vs. “恢复/重建”)类描述更让个体感知到慈善项目可以帮助求助者增加获得。”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提出此条建议。在修改稿中，我们将原假设 H1 删除，仅在正文中对募捐信息的分类进行详细阐述。同时，将原假设 H2-H5 修改为现假设 H1-H4，并将每条假设修改为变量间关系的直接描述。修改后的假设如下所示：

“H1：募捐信息类型(“恢复/重建” vs. “改善/提高”)影响个体感知的慈善项目功能(减

少损失&增加获得): 对于减少损失的评价,“恢复/重建”高于“改善/提高”;对于增加获得的评价,“改善/提高”高于“恢复/重建”。

H2: 事件可控性(不可控 vs.可控)影响个体关注点(减少损失&增加获得): 对于个体关注减少损失的程 度,不可控高于可控;对于个体关注增加获得的程 度,可控高于不可控。

H3: 募捐信息类型(“恢复/重建” vs.“改善/提高”)与事件可控性(不可控 vs.可控)的匹 配影响个体捐赠意愿。当事件不可控时,“恢复/重建”比“改善/提高”的个体捐赠意愿更 高;当事件可控时,“改善/提高”比“恢复/重建”的个体捐赠意愿更高。

H4: 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对个体捐赠意愿的影响被投入感所中介。”

意见 4: 建议对研究的几个关键变量,如“恢复/重建”、“改善/提高”、“事件可控性”等, 附上相应的英文。

回应: 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已根据您的建议加入了研究关键变量的对照英文,具体修 改如下所示:

1. “恢复/重建”(Recovery)、“改善/提高”(Improvement)(具体请见正文“1.1 募捐信 息类型:感知功能的差异”第 2 段蓝色英文字体处);

2. 事件可控性(Controllability of Event Cause)(具体请见正文“1.2 事件可控性:个体关 注点的差异”第 1 段蓝色英文字体处);

3. 调节定向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具体请见正文“1.2 事件可控性:个体关注 点的差异”第 3 段蓝色英文字体处)。

意见 5: 图 2“研究框架与实验逻辑”,建议修改为理论模型图。并增加一段文字表述几个研 究的逻辑关系。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将原“研究框架与实验逻辑”图修改 为“理论模型”图,并在下方增加了一段描述 6 个研究之间逻辑关系的文字。具体修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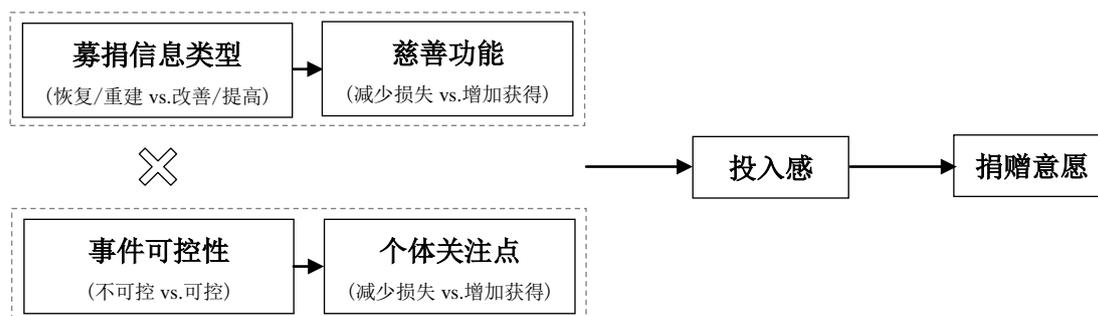


图 2 理论模型

“本文设计了 6 项研究(1 个二手数据与 7 个实验)对以上假设进行验证。研究 1 使用二手数据确认将慈善信息分为“恢复/重建”和“改善/提高”是合理的,并发现在现实中存在“恢复/重建”与不可控事件、“改善/提高”与可控事件常一起出现。研究 2 在实验中要求个体回忆“恢复/重建”或“改善/提高”的募捐信息,再次验证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存在共变关系。研究 3a 与 3b 证明“恢复/重建”比“改善/提高”信息更能减少损失,但是更不能增加获得。研究 4 证明不可控事件比可控事件引起个体更多关注减少损失,更少关注增加获得。研究 5a 与 5b 验证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可以提升个体捐赠意愿。研究 6 进一步对投入感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意见 6: 附录中,“3 二手数据: 匹配对捐赠意愿的提升作用”,这部分数据非常有价值,建议调整到正文。考虑到不同募捐项目的捐款数目和数量的差异,如使用转换标准分数,结果可能比直接人均捐款为指标更可靠和敏感。

回应: 衷心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参考您的建议,我们将附录中“二手数据: 匹配对捐赠意愿的提升作用”移至正文研究 1 中(具体请见研究 1 中“2.2 数据分析与结果”第 4-5 段)。

针对转换标准分数的问题,由于我们爬取的数据中,每个慈善项目只有一个捐款总额(已募善款)和参与捐款的人数(参捐人数),故在数据分析时使用了人均捐款作为衡量捐款意愿的指标,而非转换为标准分数。

意见 7: 文中效应量的报告方式不太符合通用方法,目前通常是报告效应量和效应量的 95%CI,如学报 2022 年 54(3)期中,“男性对他人惩罚的估计显著高于女性($t(1972) = 2.16, p = 0.031, d = 0.10, 95\%CI = [0.01, 0.29]$)”(杨莎莎,陈思静,2022)(<http://journal.psych.ac.cn/xlxb/article/2022/0439-755X/0439-755X-54-3-281.shtml>),除非是没有明确效应量的统计检验,才改为报告差异值的 95%CI。建议通篇核查并修改。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建议。我们对置信区间的报告进行了通篇核查与修改。在修改稿中,除了两样本率 z 检验报告的仍是差异值的 95%CI 之外,其余均进行了修改。具体分析方法的效应量与置信区间如下所示:

1. 成对样本 t 检验: 效应量 Cohen's d , d 值的 95%CI;
2. 单因素方差分析: 效应量 η^2 , η^2 的 90%CI;
3. 双因素方差分析: 效应量 η_p^2 , η_p^2 的 90%CI。

(具体修改请见正文各研究的数据分析报告)

意见 8: 部分表格标题和报告内容不规范, 缺乏明确说明, 如“表 3 信度检验与成对样本 t 检验结果”, 看标题或表头, 都不清楚具体是哪个研究什么变量的什么统计值。建议通篇核查修改。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正。我们对文中所有的表格标题与报告内容进行了核查。具体的, 我们修改了表 1-表 4 的标题, 并对表 3 与表 4 的报告内容进行了调整。

(具体修改请见正文各表格蓝色字体处)

意见 9: 几处数字保留小数点后位数不规范, 如“CI: [0.1104, 0.4468]”。请注意通篇核查修改。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细致审阅与宝贵建议。我们对全文的数据报告进行了反复核查, 并对保留小数点后位数不规范问题进行了修改, 感谢您的提醒!

(具体修改请见正文数据报告各蓝色字体处)

意见 10: “投入感的中介作用”部分, 考虑到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建议补充一个模型图, 注明模型中每一条路径的效应, 包括可控性的调节效应。如学报 2022 年 54(4), (张慧, et al., 2022) (<http://journal.psych.ac.cn/xlxb/article/2022/0439-755X/0439-755X-54-4-398.shtml>)

回应: 特别感谢您的宝贵建议。参考您提供的这篇文献的做法, 我们补充了一个调节中介作用图, 并在图中注明了每一条路径的效应。具体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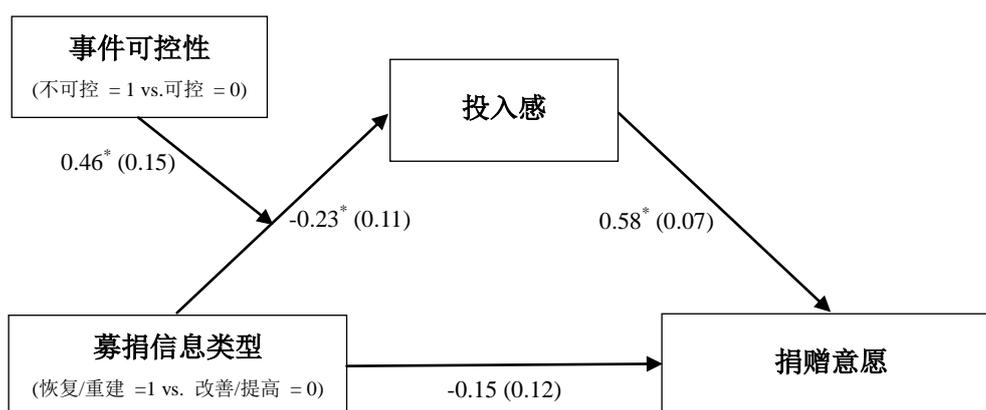


图 8 调节中介作用

注: * $p < 0.05$, 括号中为标准误

意见 11: 文章的可读性有待改善, 有较多重复性的分析和内容, 尤其是后几个研究报告募

捐类型和可控性的作用时，显得比较冗长。例如，实验 4a 中两个情境差异非研究主要关注变量，建议在正文中简要报告两个情境结果是否一致，详细报告放在补充材料中。实验 4b 除情境差异外，其他设计内容均与 4a 类型，为增加可读性，建议大幅度删减重复性内容。报告主要结果即可。且避免使用长句，如“框架效价指募捐信息采用积极框架强调捐赠的潜在益处还是消极框架强调不捐赠的负面影响(Chang & Lee, 2009)。”。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细致审阅与具体建议。您的建议对我们改善文章的可读性有重要作用，以下为针对上述问题的一一修改与回应。

1. 原实验 4a 洪灾与火灾情境分析结果。我们在原实验 4a(现研究 5a)中简要报告了两个情境的结果一致，并将分情境检验的详细报告移至附录 4 中(请见正文“6.1.2 数据分析与结果”蓝色字体与附录 4 中“2 研究 5a: 洪灾与火灾情境分析结果”)。

2. 原实验 4b(现研究 5b)。我们大幅删减了与研究 5a 重复的内容，仅保留了必要的实验设计描述与主要数据结果报告(请见正文“6.2 研究 5b: 疾病帮扶情境”)。

3. 对于长句及其他可读性问题。我们对全文进行了反复阅读和审阅修改，尽量避免出现长难句和其他可能影响读者理解的句式表达，修改达数十处，力求做到行文流畅、可读性强。再次衷心感谢您的宝贵建议!

第三轮

编委复审意见:

文章经过多次修改，已经比原文有了很大提高，但还有一些地方可以改进:

意见 1:摘要写得不好。作为一个对研究内容不甚了解的读者，很难理解摘要中提到的一些概念，结果的总结也太过琐碎，重点不够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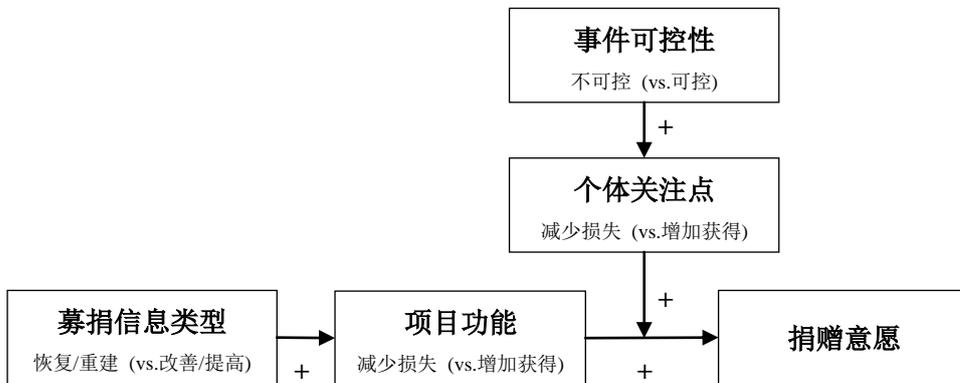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参考您的建议，我们对摘要进行了修改。在修改后的摘要中，我们对“恢复/重建”与“改善/提高”两类募捐信息进行了简要介绍，以使读者了解文章的关键概念。同时，我们对研究结果进行了精炼，突出了重点结论。修改后的摘要如下所示:

“作为募捐信息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求助者境况的不同描述理应影响募捐效果，却未引起学者们关注。本研究根据对求助者境况变化过程的不同描述，将募捐信息分为“恢复/重建”(境况由好及差，强调由损失恢复至原状)和“改善/提高”(当前境况很差，强调捐赠使其变得更好)两类。通过 1 个二手数据($N = 978$)和 6 个实验($N = 1163$ ，研究 2/3a/3b/4/5a/5b)发现，“恢复/重建”(vs.“改善/提高”)类描述让人感知更有利于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而当个体面对不可控(vs.可控)事件时也更关注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基于调节焦点的匹配，不可控事件采用“恢复/重建”(vs.“改善/提高”)类描述，可控事件采用“改善/提高”(vs.

“恢复/重建”)类描述,个体捐赠意愿(研究5)和实际捐赠(二手数据)更高。本文在理论上提出募捐信息的新分类并证明其后续影响,在实践中可指导慈善组织根据事件可控性合理设计募捐信息。”

意见 2: 作者将图 2 作为本文的理论模型,但这个模型太过笼统,看上去就是对研究中的一些关键变量的简单堆砌。图中的箭头代表什么?因果还是相关?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投入感之前的箭头没有和其他变量相连接,什么意思?总体来说,这个模型有些牵强,没有起到一个理论模型该有的作用。

回应: 特别感谢编委提出此条宝贵意见。通过对您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认为原理论模型确实存在含义模糊的地方。因此,我们对理论模型进行了修改。为了显示作用的方向,我们对构念的表示形式进行了修改,请知悉。修改后的理论模型如下所示:



意见 3: 图表过多,建议将一些汇报类似结果的图合并。图 3 需要加误差,表 1 和表 2 需要添加注释,解释表中显示的数值是什么。

回应: 非常感谢编委的重要建议。参考您的建议,我们做了如下修改:

1. 将图 3 加上了误差线(具体修改请见“图 3”)。

2. 由于原表 1 与原表 2 汇报的数值指标相同,故在修改稿中将原表 1 与原表 2 合并为现表 1,并在表格下方添加了注释,解释表中显示数值的含义(具体修改请见“表 1”)。

3. 由于原表 3 与原表 4 汇报的数值指标相同,故在修改稿中将原表 3 与原表 4 合并为现表 2(具体修改请见“表 2”)。

意见 4: 在审稿人的建议下,你们对大多结果加了 Confidence Intervals (CI),但有些结果不仅没有 CI,也没有效用,希望能保持一致。关于 CI,虽然没有必然的标准,但大多数文章汇报的是 95%CI,你们是 90%。在 90%的情况下,我大概地数了一下,有 10 个左右左边

低值为 0 或者接近与 0，这不免让人对结果效用的存在性产生怀疑。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的细心审阅与宝贵意见。以下为针对上述两个问题的修改与回复：

1. 关于效用与 CI 值的报告问题，我们补齐了未报告效用和 CI 值的部分，以使全文保持一致(具体修改请见正文各研究的数据分析报告)。

2. 编委提到的我们报告 90%CI 的情况，主要出现在报告方差分析效应量，即 $\text{partial } \eta^2$ 的置信区间上。在报告差异的效应量时一般报告 95%CI，我们在论文当中也是这么做的。在之前的审稿过程中，审稿人建议在报告 $\text{partial } \eta^2$ 之后应该报告其置信区间而非差异量的置信区间。而根据以往研究，对于方差分析效应量置信区间的计算，通常报告 90%的置信区间即可(Steiger, 2004; 王珺等, 2019)。原因在于方差分析是 F 检验，而 F 检验属于单侧检验。对于 $\alpha = 0.05$ 的显著性统计标准，若计算 95%的置信区间，则可能出现置信区间包含 0 而 $p < 0.05$ 的情况，此时置信区间的结果与 p 值便存在矛盾(见 Karl Wuensch 的解释：<http://core.ecu.edu/psyc/wuenschk/docs30/CI-Eta2-Alpha.doc>)。同时，Steiger (2004)指出均值比较的 95%置信区间和 $\text{partial } \eta^2$ 的 90%置信区间得到的检验效力是一样的，且方差分析的效应量 $\text{partial } \eta^2$ 为平方值，不可能为负值，所以置信区间的下限至少为 0，而这也与 95%的置信区间可能包含 0 的情况相违背。因此，针对方差分析效应量的置信区间，我们报告的是 90%CI 而非 95%CI。

修改稿中，我们在首次出现报告 $\text{partial } \eta^2$ 的 90%CI 的地方，对为何报告 90%CI 而非 95%CI 进行了简要解释，并在该处添加了脚注进行详细解释(具体修改请见正文“研究 1 中匹配对捐赠意愿的提升作用”蓝色字体处)。

涉及的参考文献：

Steiger, J. H. (2004). Beyond the F test: Effect size confidence intervals and tests of close fit in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contrast analysis. *Psychological Methods*, 9, 164–182.

王珺, 宋琼雅, 许岳培, 贾彬彬, 胡传鹏. (2019). 效应量置信区间的原理及其实现. *心理技术与应用*, 7(05): 284–296.

意见 5：研究 6 比较鸡肋。一是结果得到的模型不完全是 H4 中假设的，二是路径的显著性都不高，结果不是很有说服力，三是这是唯一一个建议投入感作用的研究。总体看来，我觉得文章现在已经较长，加入投入感并没有对研究有显著的提升，可以考虑去掉所有关于投入感的内容。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参考您的建议，我们删除了研究 6，同时将理论部分涉及投入感的中介作用的假设与解释进行了删除。

意见 6: 总讨论过于肤浅, 没有与相关的理论呼应, 也没有对研究进一步拔高, 建议加深思考。

回应: 特别感谢编委的重要建议, 您的提醒促进了我们对研究的进一步思考。根据您的建议, 我们在理论贡献部分对与研究相关的理论进行了呼应, 特别是从对未来研究的启示的角度尝试提高研究的高度(具体修改请见正文“7.1 理论贡献”蓝色字体处)。

再次衷心感谢编委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

审稿专家 3 意见:

作者关注了事件可控性和募捐信息表述方式对个体捐赠意愿的营销及其心理机制, 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文章也存在如下问题, 需要作者进一步论证和回应, 具体如下:

意见 1: 本研究的第一自变量(即募捐信息类型)是研究的重点内容, 但是对该研究构念的界定及其相应的理论支持不够完整、全面以及深入。

a) 首先, 本论文在本质上还是研究的募捐信息类型对捐赠行为的影响, 并不是作者所说的“动态视角”。从研究材料上也能看出来, 作者研究的还是募捐信息被 frame 成为“恢复/重建”还是“改善/提高”对消费者捐赠行为的影响。因此, 作者反复强调的理论贡献之一是从动态视角入手是有失偏颇的。

b) 本研究的募捐信息类型被分类为“恢复/重建”和“改善/提高”的理论基础不足。作者提出的分类原因是 (1)时间动态变化维度, 和 (2)语义层面。但是无论从哪个视角, 作者都没有给出相应的文献支持。事实上, 在这整个段落里, 作者并未提供任何文献。我理解作者认为这是一种理论创新, 但是无论是怎样的理论创新都应该是基于一定的理论, 有时是跨学科的理论, 才能谈创新。如果没有这些相应的理论支持, 会引发很多质疑的。因此, 建议作者 (1)重新梳理这两种类型的核心含义, 找到能够将其正确划分的底层逻辑; (2)在这个底层逻辑层面补充相应的文献来支持该分类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3)如果这个底层逻辑的文献支持是充分的, 是不必要在实验中进行论证的; 但如果不充分, 应该如何通过实验进行论证?

c) Focus on gains/loss theory 是不是分类的底层逻辑? 为什么不是别的底层逻辑? 如果是底层逻辑, 文献应该怎么写比较合适? 需要在研究中论证底层逻辑吗? 如果需要, 如何通过研究设计来论证底层逻辑?

d) 相应的, 将上述问题梳理和修改后, 应该对部分实验进行调整, 甚至删除。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审稿专家主要提及募捐信息类型的理论贡献和底层逻辑及其证明两个方面。对于募捐信息类型的理论贡献(意见 a), 我们非常认可您的

观点，此处并没有必要强调动态，特别本研究并不涉及动态和静态的对比，从动态视角入手是有失偏颇的。因此我们已经将正文中关于“动态视角”的表述进行删除。

对于募捐信息类型的底层逻辑及其证明(意见 b-d)，我们非常抱歉由于论文当中缺乏其底层逻辑的说明所造成的误解。实际上，文中对于两类募捐信息的定义，也是基于对现实中两类募捐信息的大量观察总结而来的，即该分类是对于募捐实践的归纳，而不是根据某一理论的演绎。在本次修改稿中，我们将提出募捐信息类型的底层逻辑是从实践中归纳而来加以说明(详见“1.1 募捐信息类型：感知功能的差异”第二段蓝色字体处)，并强调研究 1(二手数据)是对这一观察归纳合理性的佐证。

相应的，Focus on gain/loss theory (Regulatory focus theory)也并不是分类的底层逻辑。本文根据募捐信息类型的不同特点推出“恢复/重建”类信息更能让人感觉到有助于减少损失，“改善/提高”类信息更能让人感觉到有助于增加获得。募捐信息类型为因，知觉到的减少损失/增加获得为果。我们在研究 3a 与 3b 中分别使用从真实募捐信息和回忆信息中得到的“恢复/重建”类与“改善/提高”类募捐信息作为实验材料，验证了募捐信息类型对个体感知的慈善项目功能的影响(即 H1)。如果在论述中将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作为分类的依据，则对于本文而言有循环论证的问题。

我们认为把研究 1 作为从实践中归纳出不同募捐信息类型的佐证，把研究 3a 和 3b 作为募捐信息类型对个体感知的慈善项目功能的影响，是能够较好支撑本文逻辑的。

再次真诚感谢您的意见与建议！

意见 2：本研究的第二自变量或者是调节变量(即事件可控性)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研究构念，但是在本研究中，这个构念的定义、操作化定义以及后续的实验材料中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此使得研究内容不够严谨和准确。

a) 引言 p.28：气候变化是可控的？那为什么后续认为“洪灾”“水灾”里还能分出来是可控的洪灾(水灾)和非可控的洪灾(水灾)？同理，“乳腺癌”是不可控的？癌症除了存在基因的问题外，还有影响因素是不良生活方式或者心态，那这些是可控还是不可控的？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事件可控性”应该被界定为消费者“感知事件可控性”--在后续的实验设计里，应该就一个事件让消费者打分，即消费者认为该事件的可控性是高还是低。但明显实验中并不是这样操控事件可控性的。

b) 在实验中，你们将事件可控性处理的是 framing effect。即针对同一事件，将其 frame 为人为原因或者非人为原因。实际上，你们研究的两个自变量都是 framing effect。

c) 因此，建议 (1)将“事件可控性”修改为“事件可控程度”；(2)事件可控程度在文献部分和实验部分进行统一，以保证研究内容的准确。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耐心提问与宝贵意见。首先，我们对于前后矛盾之处表示非常抱

歉。我们认同对于气候变化与乳腺癌的可控性存在模糊的地方，因此我们在正文中将关于气候变化和乳腺癌的相关表述进行了删除。其次，在本文中，事件可控性特指引发困境的事件起因是否人为可控。也就是说是否存在某些人类主体可以控制该事件的发生(Hildebrand et al., 2017; Winterich & Zhang, 2014)，且并不对涉事的人类主体加以限制，也不讨论事件导致的困境后果是否可控。因此，在现实中，判断事件是否可控的唯一标准是针对导致求助者陷入困境的事件，是否存在能影响该事件发生的人类主体。若存在，则事件可控；若不存在，则事件不可控；若无法判定，则视为不明确。以火灾为例，若在募捐信息中交代了火灾是由野炊、烧荒等人为因素导致的，则这场火灾是可控的；若交代火灾是因高温干旱等自然原因导致的，则这场火灾不可控；若未交代原因，则这场火灾的可控性不明确。在修改稿中，我们在引言当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具体请见正文“1 引言”第三段蓝色字体处)。

如何所述，事件是否可控是一个客观指标，而非不影响实质的语言框架。框架效应特指不改变实质，只改变语言框架即产生影响，与本文这里的事件可控性定义不一致。也就是说事件可控性在知晓事件原因的基础上是可以被客观界定的，而不受到语言框架的操控。而且它应该是一个基于事实的二分变量，将其修改为“事件可控程度”可能会造成其为连续变量的误解，因此我们在文章当中保留了“事件可控性”的表述。我们也对之前表述不清所引起的概念误解表示抱歉，希望我们的修改已经明确了该构念的定义。

最后，在开展实验时，为了保证被试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在同一个实验中均使用同一个困境(即火灾、洪灾与耳聋)。但是，我们对于事件可控性的操控，是针对导致求助者陷入困境的事件，是否存在能影响该事件发生的人类主体，而非困境本身或困境导致的后果是否可控，且被试的操控检验结果均支持我们对于事件可控性的操控是成功的。所以，我们认为实验部分对于事件可控性的操控与理论部分描述的事件可控性的概念是一致的。

涉及的参考文献：

- Hildebrand, D., DeMotta, Y., Sen, S., & Valenzuela, A. (2017). Consumer responses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contribution typ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4(4), 738–758.
- Winterich, K., Mittal, V., & Aquino, K. (2013). When does recognition increase charitable behavior? Toward a moral identity-based model. *Journal of Marketing*, 77(3), 121–134.

意见 3：研究的因变量(捐赠意愿)

a) 应该放在关键词里

b) 捐赠行为的研究里，应该有一个实际行为的测量，以避免 demand effect 或者社会期望答案。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意见与建议。以下是针对上述问题的一一回复：

a) 参照您的建议，我们已将关键词中的“个体捐赠”修改为“捐赠意愿”。

b) 我们非常认同您提出的需要用实际行为来表示捐赠意愿的建议。事实上，为了探索在现实中个体对于不同类型募捐信息的真实反应，我们已从“支付宝公益平台”爬取了真实的募捐信息，据此开展了 1 项二手数据研究，且二手数据研究的结果也初步支撑了研究假设，即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对个体的实际捐赠行为确实具有提升作用(详见正文研究 1)，我们在摘要中也补充强调了这一点。再次感谢您的建议！

意见 4：关于研究设计

a) 还是需要按照 study 的数量来统计总数，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 1 个二手数据和 7 个实验放在一起是 6 个研究。

b) Study 的总数太多了，只要论证清楚就可以了，这么多的实验都是不同的实验目的吗？例如，研究 2 和研究 5 都验证的主效应(信息类型和可控性对捐赠意愿的交互效应)，为什么需要 2 个实验呢？

c) 同样，还是要与轻重之分，假设 1 和 2 的部分用了 4 个 study，这个部分是研究的焦点吗？

d) 研究 1(二手数据)：因为事件可控性进行了编码，请补充举例说明“可控事件”、“不可控事件”，便于理解。同理，募捐信息类型也需要给出写的更为准确，是不是仅 code “恢复/重建”、“改善/提高”这 2 组词？还是将一些同义词都 code 成为这两组构念。请补充相关内容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重要意见与建议。以下为针对上述问题的一一修改与回复：

a) 感谢您的耐心指正，在修改稿中，我们根据编委的意见删除了研究 6。目前一共包括 1 个二手数据研究和 6 个实验。我们将它们编码为研究 1、研究 2、研究 3a、研究 3b、研究 4、研究 5a 和研究 5b。

b) 在编码时，数字编号不同的研究，目的有所不同。研究 1 使用二手数据确认将募捐信息分为“恢复/重建”和“改善/提高”两类是合理的，并发现在现实中存在“恢复/重建”与不可控事件、“改善/提高”与可控事件常一起出现。研究 2 在实验中要求个体回忆“恢复/重建”或“改善/提高”类募捐信息，再次验证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存在共变关系。研究 3a 与 3b 证明“恢复/重建”比“改善/提高”类信息更能减少损失，但是更不能增加获得(即 H1)。研究 4 证明不可控事件比可控事件引起个体更多关注减少损失，更少关注增加获得(即 H2)。研究 5a 与 5b 验证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可以提升个体捐赠意愿(即 H3)。也就是说，研究 2 与研究 5 的目的不同。研究 2 证明一般个体能够感知到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关系，并未测量捐赠意愿。

c) 由于我们对募捐信息的分类是从实践中而来，故首先需要二手数据来验证该分类标准的充分性与合理性，且需要验证在现实中和个体感知中确实存在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

性的共变关系，因此开展了研究 1 和研究 2。同时，为了验证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得以匹配的内在逻辑，即募捐信息类型影响的感知慈善项目功能与事件可控性影响的个体关注点在调节焦点上存在匹配，随后才会影响个体捐赠意愿，因此开展了研究 3 与研究 4。这些研究是产生匹配效应的基础，因而在实证部分对该部分内容进行了系统验证。

d) 关于编码问题：

(1) 针对事件可控性的编码，我们在正文中增加了对“可控事件”和“不可控事件”的举例：“具体的，可控事件如儿童性教育缺乏、重组家庭孩子的困境等；不可控事件如先天性心脏病、突发暴雨洪水灾害等”，且在附录 1 中相应增加了两类事件的详细示例(具体修改请见“研究 1 中事件可控性编码”蓝色字体处与附录 1 中“2.2 示例”处)。

(2) 针对募捐信息类型的编码，我们在正文中增加了编码的主要关键词与举例：“具体的，“恢复/重建”类指在项目简介中使用了“恢复”、“康复”、“重建”、“重返”及其同义词的描述，如为陕西多地灾后困境妇女家庭提供援助金，助他们重建家园；“改善/提高”类指在项目简介中使用了“改善”、“提高”、“提升”、“增强”及其同义词的描述，如“为困难群体提供生活补助支持，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其他指使用了其他维度描述方式或同时描述了恢复与改善的情况，如生命有爱-白血病患者救助计划”，且在附录 1 中增加了编码的详细关键词(具体修改请见“研究 1 中募捐信息类型编码”蓝色字体处与附录 1 中“1.2 编码关键词”处)。

意见 5：除了上述框架和研究设计存在的问题外，本文行文与措辞不够规范，例如关键词、假设等，既不准确、也不规范。例如：

a) 关键词里至少应该有因变量吧？第 4 个是吗？是不是应该是“捐赠行为”或者“捐赠意愿”？

b) 研究 3 的标题里的“感知强调点”是什么？

c) 假设 1 “:”后面应该写成一句完整的表述，现在的假设 1 的后半部分看不懂。

d) 假设 2 “:”后面的表达也是看不懂的。

e) 假设 3 的第二句话，表达的不完整。

假设是这么重要的内容，但写的非常不规范。如果不看全文，只看假设，是非常令人困惑的。请作者务必重新写假设，请使用完整的一句一句话说进行表述。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与建议。以下为针对上述问题的一一修改与回应。

a)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已将关键词中的“个体捐赠”修改为“捐赠意愿”。

b) 感谢您的指正，我们已将研究 3 的标题修改为“研究 3：募捐信息类型影响感知慈

善项目功能”。

c) 将假设 1 修改为：“募捐信息类型(“恢复/重建” vs. “改善/提高”)影响个体感知的慈善项目功能(减少损失&增加获得)：个体感知“恢复/重建”类描述比“改善/提高”类描述更能够帮求助者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而感知“改善/提高”类描述比“恢复/重建”类描述更能够帮求助者增加获得(vs.减少损失)”。

d) 将假设 2 修改为：“事件可控性(不可控 vs.可控)影响个体关注点(减少损失&增加获得)：个体在面对不可控事件时比面对可控事件时更关注减少损失，而在面对可控事件时比面对不可控事件时更关注增加获得”。

e) 将假设 3 修改为：“募捐信息类型(“恢复/重建” vs. “改善/提高”)与事件可控性(不可控 vs.可控)的匹配影响个体捐赠意愿。对于不可控事件，“恢复/重建”类描述比“改善/提高”类描述导致更高的个体捐赠意愿；而对于可控事件，“改善/提高”类描述比“恢复/重建”类描述导致更高的个体捐赠意愿”。

第四轮

审稿专家 3 意见：

作者对上一轮意见都进行了回复，且整个论文在逻辑性、严谨性以及准确性均有所提升。建议再对以下问题进行进一步的修订。

意见 1：引言-第 36 页第二段“试图解决以下问题”：这几个问题的提出在这里还是太突兀了，你们的研究既包括探索性的(如问题 1-4)，也包括因果性的(如问题 5)，但是在这 5 个问题出现前的部分里讨论的更多的是关于这个因果性研究的内容，缺乏对前面探索性研究的这个部分的讨论。如果没有看后面的内容的话，只看第二段时会觉得非常突兀。还是需要进一步修订，可以将研究界定为一个两段式研究，这样比较清晰。

回应：特别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阅与重要建议。我们非常认同您对于研究问题类型的划分，即问题 1-4 为探索性问题，问题 5 为因果性问题，对问题类型的界定可以使论文的内容结构更为清晰。参考您的建议，我们对引言做了如下修改：

1. 修改了对募捐信息类型划分的讨论，并铺垫其对感知慈善项目功能的影响(详见“1 引言”第二段蓝色字体处)。

2. 增加了对募捐事件情境的讨论，以引出事件可控性，并铺垫其对个体关注点的影响(详见“1 引言”第三段蓝色字体处)。

3. 明确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中包含 4 个探索性问题与 1 个因果性问题(详见“1 引言”第四段蓝色字体处)。

意见 2: 1.1 标题中“:”前后的两个内容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是不同类型信息的感知功能不同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能用“:”连在一起写吗? 这个语义略微不清, 请修订。另外, 感知信息类型在你们的研究中是独特的, 是你们提出来的构念, 所以应该在题目中有所体现, 如基于...募捐信息类型等, 还有就是要表达清楚这个信息类型和后续提及的感知功能差异之间的关系。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与建议。参考您的建议, 我们进行了如下修改:

1. 将 1.1 的标题修改为“1.1 募捐信息类型对感知慈善项目功能的影响”。
2. 将论文题目修改为:“募捐信息该强调恢复还是改善? 事件可控性的调节”。

3. 更清晰地论述了募捐信息类型对感知慈善项目功能的影响(具体修改请见“1.1 募捐信息类型对感知慈善项目功能的影响”第三段蓝色字体处)。

意见 3: 1.2 的标题写法问题同上, 请一并修改。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重要意见与建议。参考您的建议, 我们已将 1.2 的标题修改为:“1.2 事件可控性对个体关注点的影响”。

意见 4: 研究顺序安排: 应该与假设提出的前后顺序保持一致。按照假设的顺序, 研究 3、4 应该在研究 2 的前面, 因为按照你们研究的假设推导, 应该是先论证捐赠信息类型对感知功能存在显著影响、事件可控性对个体关注点的影响; 基于这样一个逻辑, 才有后续的捐赠信息类型和事件可控性的共变(交互), 且该交互作用于后续的捐赠意愿。是不是这样一个逻辑?

回应: 特别感谢审稿专家提出此条宝贵建议。我们非常认同您对研究逻辑的梳理, 以及对研究顺序的重新安排。按照我们进行逻辑推理以及相应假设提出的顺序, 的确应该先论证募捐信息类型对感知慈善项目功能的影响(研究 3a 与 3b), 再论证事件可控性对个体关注点的影响(研究 4), 之后论证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关系(研究 2)及二者匹配对捐赠意愿的影响(研究 5a 与 5b)。所以, 将研究 3 和研究 4 放在研究 2 之前较为合理。

然而, 在实际开展实验时, 研究 3b 的实验材料来自于研究 2。具体的, 我们从研究 2 得到的“恢复/重建”类与“改善/提高”类募捐信息中, 各随机抽取了 7 条用作研究 3b 的实验材料。因此, 若将研究 2 移至研究 3 后面, 将无法交代清楚研究 3b 实验材料的来源。考虑到该问题, 我们未能够在修改稿中对研究顺序进行调整, 对此我们深感抱歉。不过, 理论模型下方有一段对 7 个研究(1 个二手数据和 6 个实验)的总体介绍, 期望这段介绍能够表述清楚研究的顺序与逻辑。

意见 5: 研究 5 是不是必须需要两个实验? 是不是两个实验的区别主要是中国情境? 需要在实验 5 开始的地方阐述清晰两个实验的逻辑、不同之处、以及为什么需要两个实验。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重要意见与建议。以下是针对上述问题的回复与修改:

1. 关于研究 5 包含两个实验的问题。现有研究表明, 不同的募捐情境会影响慈善项目的募捐结果, 如求助者类型为个体或群体, 以及事件为突发的灾难(如地震、洪灾、火灾等)或持续的悲剧(如疾病、环境污染等)均会对个体捐赠意愿产生影响(Friedrich & McGuire, 2010; Small et al., 2005; Vanhamme et al., 2012; Zheng et al., 2019)。研究 5a 和 5b 分别在灾害救助和疾病帮扶情境下开展实验, 这两个募捐情境的求助者类型和事件紧急性均不相同, 使用不同的研究情境可以提升匹配效应的稳健性, 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

2. 关于研究 5a 与研究 5b 的区别。如上所述, 两个实验情境的区别在于求助者类型和事件紧急性的不同, 而非是否为中国情境。具体的, 研究 5a 的灾害救助情境, 其求助者类型为群体, 且属于突发的灾难; 研究 5b 采用的疾病帮扶情境, 其求助者类型为个体, 且属于持续的悲剧。另外, 两个实验均以中国为背景进行情境设计, 因此, 我们将“6.3 讨论”中关于中国国情的表述进行了删除, 再次感谢您的提醒。

3. 在修改稿中, 我们在研究 5 开始的地方增加了对两个实验的不同之处和必要性的讨论。具体如下:

“现有研究表明, 求助者类型为群体或个体, 以及事件为突发的灾难(如地震、洪灾、火灾等)或持续的悲剧(如疾病、环境污染等)均可能对个体捐赠意愿产生影响(Friedrich & McGuire, 2010; Small et al., 2005; Vanhamme et al., 2012; Zheng et al., 2019), 因而单一捐赠情境下实验结果的代表性容易受到质疑。研究 5a 采用的灾害救助情境, 其求助者类型为群体, 且属于突发的灾难; 研究 5b 采用的疾病帮扶情境, 其求助者类型为个体, 且属于持续的悲剧。在不同的情境下验证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对个体捐赠意愿的提升作用, 可以提升研究的外部效度。”

涉及的参考文献:

Friedrich, J., & McGuire, A. (2010).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asoning style as a moderator of the 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 *Social Influence*, 5(3), 182–201.

Small, D. A., Loewenstein, G., & Slovic, P. (2007). Sympathy and callousness: The impact of deliberative thought on donations to identifiable and statistical victim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02(2), 143–153.

Vanhamme, J., Lindgreen, A., Reast, J., & van Popering, N. (2012). To do well by doing good: Improving corporate image through cause-related marketing.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09(3), 259–274.

Zheng, L., Zhu, Y., & Jiang, R. (2019).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elevation in cause-related marketing: A mor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56(2), 439–454.

意见 6: 建议作者还是需要将文字表达再锤炼一下,使其更为清晰。第 8 节研究结论写的是最清晰的。可以参考这样的写法写整个论文。必要时可以请非本文作者进行一下校对和润色,第三方比较容易能看出行文中存在的语言表达问题。

回应: 特别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阅与宝贵建议。按照您的建议,我们对全文进行了反复阅读,并参考第 8 节的写法对文章表述中晦涩难懂与表述不清晰之处进行了修改。另外,我们邀请了不了解本研究的第三方对文章进行了校对与润色,力求做到逻辑连贯、表述清晰、行文流畅。衷心感谢您的宝贵意见与建议!如果您有进一步修改建议,我们非常愿意继续精进。

第五轮

审稿专家 3 意见:

作者对上一轮意见都进行了回复,且整个论文在逻辑性、严谨性以及准确性均有所提升。建议再对以下小问题进行进一步的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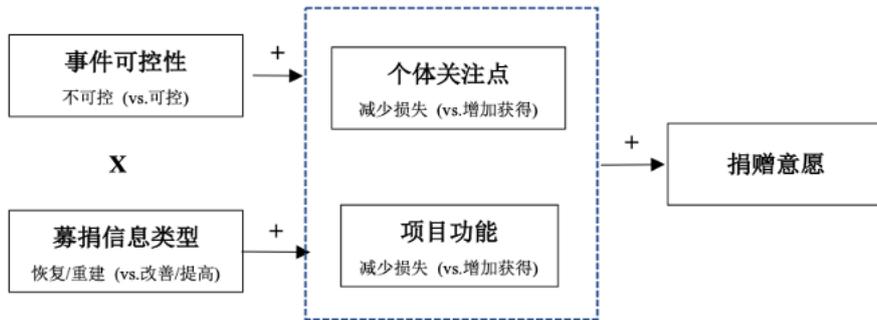
意见 1: 论文标题:请在主标题的“?”后,加上“:”。即“募捐信息该强调恢复还是改善?:事件可控性的调节”。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在参考建议的基础上,为了更清楚地表达研究主题,我们已将论文标题修改为:“募捐信息该强调恢复还是改善受事件可控性调节”。

意见 2: 请在关键词中加上自变量的内容,如“恢复/重建信息类型;改善/提高信息类型”;同时可以删除过于笼统的关键词,如“慈善捐赠”。

回应: 特别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与建议。参照您的建议,我们在关键词中加入了自变量的内容,并删除了较为笼统的关键词。修改之后,本文的关键词包括:“恢复/重建”信息类型;“改善/提高”信息类型;事件可控性;调节匹配;捐赠意愿。

意见 3: 理论模型(图 2)的表达,还是存在歧义。按照现有的画法,感知项目功能是捐赠信息类型和捐赠意愿之间的中介机制,个体关注点调节了中介,事件可控性调节了调节一—这些内容都与本研究假设不一致。我的理解是:事件可控性和募捐信息类型能够匹配,是因为他们分别导致的个体关注点和感知项目功能都是基于定向调节且方向一致。那么这个模型怎么能表达出这个匹配呢?建议作者还是应该查找文献,再思考一下这个理论模型的表达问题,尽量减少歧义,准确表达。下图仅供参考。另外,建议将“理论模型”修改为“研究框架”。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此条重要建议。经过您的分析，我们认为原理论模型确实存在歧义。我们非常认同您对本研究理论逻辑的解读，也十分感谢您对如何表达该逻辑给出了详细的建议。在您指出的模型基础上，由于募捐信息类型相关的假设在前，所以我们把募捐信息类型放在上方，事件可控性放在下方。同时，参考您的建议，我们将“理论模型”修改为“研究框架”，并对研究框架图进行了修改。具体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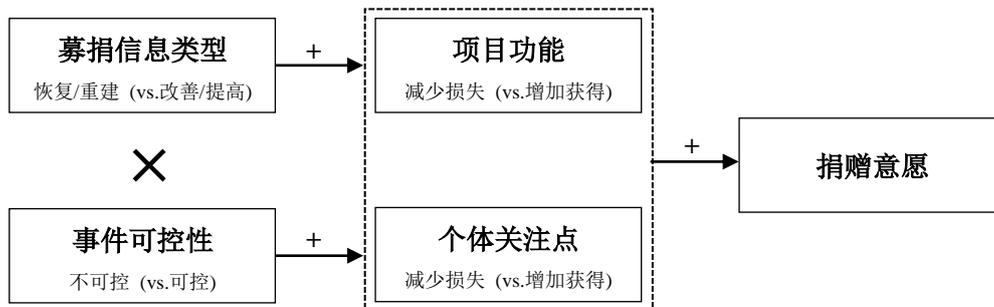


图 2 研究框架

意见 4：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没有完全匹配，请自查。

回应：特别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与耐心指正。经您提醒，我们参照修改后的中文稿，对英文标题、摘要与关键词进行了修改，使其与中文相匹配(具体修改请见“英文标题、摘要、关键词”蓝色字体处)。

意见 5：附录 4 里请注明哪些是实验 5a 材料，哪些是实验 5b 材料。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宝贵建议。在修改稿中，我们已在附录 4 中将研究 5a 的实验材料(洪灾情境、火灾情境)与研究 5b 的实验材料(疾病帮扶情境)标注清楚(详见“附录 4 中 1 研究 5 材料”蓝色字体处)。

意见 6：请再次校对文献部分：有的文献缺失完整页码；有的文献页码采用了省略模式(如

556-74), 有的没有, 请保持一致。

回应: 特别感谢审稿专家的悉心指正。我们对所有参考文献进行了检查与核对, 对缺失页码、省略页码等问题进行了逐一修改(具体修改请见“参考文献”蓝色字体处)。

意见 7: 摘要、引言部分的文字表达仍需润色和修订。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与重要建议。根据您的建议, 我们对摘要与引言部分的文字表达进行了修改与润色, 力求做到表述清晰、行文流畅(具体修改请见“摘要”与“1 引言”蓝色字体处)。

再次衷心感谢您的宝贵意见与建议!

第六轮

编委复审意见:

作者们好, 感谢你们在审稿人建议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文章。最新的稿子我看了, 认为研究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希望在写作上可以更好。具体说来, 现在稿子偏长, 对研究的具体细节可以适当删减; 同时, 研究的总讨论部分对研究结果的总结和回顾也过长, 但对研究的理论贡献没有适当的展开。希望你们能做最后的努力, 再修改一下。几个小地方: 1) 在 1.1 部分之前的一段里, 你们写到“2) 在募捐实践和个体记忆中, 是否存在“恢复/重建”信息与“可控事件”、“改善/提高”信息与“不可控事件”的自然联结?” 是不是应该是恢复/重建信息与不可控事件, 改善/提高信息与可控事件? 2) 关于 eta 效用量的问题, 我接受你们的解释, 但在文章中不能给一个别人解释这个问题的 WORD 文件的链接, 应该尝试自己解释清楚, 附加正规的参考文献。3) 图 3、4、5 汇报的是类似的结果, 原则上可以合并, 至少图 4 和图 5 可以。祝好, 责任编辑。

回应: 真诚感谢编辑老师的细致审阅与宝贵建议。参考您的建议, 我们进行了如下修改:

1. 关于文章的篇幅, 我们对各个研究的细节和总讨论中对研究结果的总结进行了适当删减, 并对理论贡献进行了适当修改(具体请见“2 研究 1 至 6 研究 5”、“7 讨论”、“7.1 理论贡献”蓝色字体处)。

2. 关于研究问题中的错别字,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正, 我们已在修改稿中进行了更正(详见“1 引言”第四段蓝色字体处)。

3. 关于 eta 效用量的问题, 我们已将 WORD 文件的链接进行了删除, 仅保留了正规的参考文献(具体请见“2.2 数据分析与结果”中脚注的蓝色字体处)。

4. 关于图表的问题, 我们已将原图 4 与原图 5 合并为现图 4(详见“图 4”)。

再次衷心感谢编辑老师的宝贵意见与建议！

主编意见：该文经过多轮评审和修改，质量已经有很大提高！建议发表！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和作者们在漫长的评审过程中的辛苦付出！期待更多高质量的稿子！